

货币*

曾康霖

古典经济学的货币产生理论

货币是怎样产生的,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中进行了研究。其代表人物,在英国为亚当·斯密,在法国为布阿尔吉尔和杜尔阁。

亚当·斯密认为,货币是为了克服交换的不灵敏而产生的。他说分工使“一个人自己的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于是就需要“交换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但是,在刚开始分工的时候,这种交换力的作用,往往极不灵敏。为了克服交换的不灵敏,于是有思虑的人,除了携带自己的劳动产品以外,还在身边带有一定数量的,能够与任何人交换的物品,货币就是这种物品发展起来的。这实际上是说货币是为了克服物物交换的困难而产生的。

这样来认识货币的起源,它的正确成分是指出了货币是为了适应交换的需要而产生的,但不正确的地方是:(1)把货币的产生归源于物物交换的困难是“非常肤浅的观点”。没有揭示货币是商品内在矛盾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认为,物物交换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而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又导源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如果不存在这样的矛盾,就不会导致商品交换,也就不会产生物物交换的困难。货币的根源在于商品本身,也就是说困难的根源在于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内部而不是外部。斯密这样看待商品交换的困难,只看到在交换中需要让渡的使用价值与需要换得的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而没有看到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所以,斯密从物物交换的外部困难中寻找货币的起源,就必然把货币看成是为了从技术上消除物物交换所遇到的困难而设计出来的一种技术工具,他不可能认识到货币是价值形式的发展,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2)货币不是“有思虑的人”发明创造的,也不是商品所有者在交换中协商的产物,而是社会共同推荐的。可是,斯密这样认识,也就否定了货币的产生“是其他一切商品的社会行为”的结果,把货币看成是“有思虑的人”的个人行为。

布阿吉尔贝尔认为,货币是由于生活需要的物品增多,不能进行物物交换而产生的。他说“如果生活所需,像在原始社会那样,减少到三种或四种,那么交易就会变为直接的以物易物”,但是,腐败习俗和繁文缛礼促使生活需要的增长,于是从人类原始社会需要的三种或四种的物品,增加到今天所需要的二百种以上的货物,因而就再也没有办法来进行像原始社会那样的物物交换。同时,一种商品的卖者,不可能经常同他实际上所需要的商品所有者相交换,而为了取得他所需要的商品,他就必须售出他所掌握的商品,这里金钱就出来帮忙。这就是说,在他看来,货币是由于人类需要商品物品的种类增加,不能直接进行以物易物而产生的。不能直接易物易物,为什么就需要金钱

* 曾康霖,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系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和中国金融出版社共同组织编纂的即将出版的《金融学大辞典》一书中的词目之一。这是一部含300多个词目,约300万字的大型工具书,要求撰写每一词目约一万字左右,释文涵盖定义或定性叙述、词源、简史、核心内容,不同学术观点等,特别是一些重要词目,还分别介绍中外词汇的来源知识。本刊摘录曾康霖教授所撰“货币”词目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出来帮忙?他说这是因为“人们出售所拥有的商品时,没有立刻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货币,于是就要使用金钱作为将来交付商品的一种保证”。这说明在布阿吉贝尔看来,由于卖者出售商品以后,不能立刻从买方那里得到自己所需的货物,需要买方以金钱来作为保证,所以需要金钱帮忙。这样来看待货币的产生,与亚当·斯密所谓的货币的产生有不同:亚当·斯密认为货币是为了克服交换的不灵敏而产生的,由于物物交换的困难,于是“有思虑的人”就发明了一种媒介物充当交换的技术工具,这种见解的着重点在于说明媒介物不可缺少,否则会给交换带来困难;布阿吉贝尔却认为货币的产生是“要用金钱作为将来交付商品的一种保证”,这种见解的着重点不在于克服交换的不灵敏,因而需要货币来充当交换的媒介,而在于充当卖者商品出卖以后的保证物。布阿吉贝尔还认为能够充作保证物不一定是金钱,还可以是任何商品。他说如果金钱不能够的话,可以用一张纸币或羊皮来代替它,于是几乎就没有商品不可以用来代替金钱,只要他们具有体现同等的价值价格就行了。这样,就把金钱看成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可见,在布阿吉贝尔看来不是为了克服物物交换的困难,需要媒介物来说明货币的产生,而是从卖者出售商品以后,需要保证物来说明货币的产生的。

除亚当·斯密和布阿吉贝尔外,对货币的产生进行系统研究的要算法国的杜尔阁。在他看来,货币是由于商品交换中,需要确立标准估价物而产生的。他的论述如下:(1)商业是由于人们需要互通有无而产生的。在互通有无中,交换双方都把自己交出的东西看成是对方商品的等值物,他说“假设一方需要谷物而另一方需要葡萄酒,再假设他们同意用一蒲式耳谷物交换六品脱葡萄酒。显然,他们双方都把一蒲式耳谷物和六品脱葡萄酒看作是完全相等的”。而且他认为一定量商品之所以与一定量的商品交换,是出于人们对那种商品的爱好和欲望,如有人对那种商品的爱好和欲望强烈,则宁愿以自己的商品去与它交换,这样,从交换双方来说也是等价的。可见,杜尔阁所说的等值物,并不是指所交换的商品价值的等同,即凝结着同样多的人类的抽象劳动,而是指交换双方把所交换的商品量看作是完全相等。(2)由于供求和竞争的影响,所交换的商品(如谷物和葡萄酒)的价值,就不再决定于两个人之间的讨价还价,而“决定于全体出卖谷物的人的需要和能力与全体出卖葡萄酒的人的需要和能力之间的平衡”。这样,就会形成一种“介于各种不同的供给和各种不同的需求之间的中间价格”,如六品脱葡萄酒等于一蒲式耳谷物,是由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条件下产生的,则六品脱葡萄酒便是一蒲式耳谷物的中间价格,相反,一蒲式耳谷物便是六品脱葡萄酒的中间价格。该商品的中间价格便是该商品的等值物。这个价格是所有的买主和所有的卖主都将遵循的现行价格。杜尔阁的这种见解,正确的一面是指创出了由于供给与需求的影响会形成一个中间价格,但他没有明确指出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的条件下,这个中间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因而这种说法也是肤浅的。(3)基于每一种商品都会形成一个中间价格,而且人们都需要遵循这个中间价格来交换,“因此,每种商品都是一定数量的各种其他商品的等值物,可以把它当作代表各种其他商品的一种担保品”。这实际上是说,“每种商品都可以用来作为衡量所有其他商品价值的尺度”。这种见解,如果从每一种商品都能够同任何一种商品相交换的意义上说是正确的,但事实不是每一种商品都能同任何商品相换,所以每种商品不可能都成为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尺度。(4)“并非每种商品都是同一种同等便利的衡量价值的尺度,因为各种商品的质量是变化的”,“一种商品的价值越是容易随着它的质量而按比例地发生变化,也就越难把它当作衡量其他商品价值的一种尺度”。这就是说,在杜尔阁看来,质量不同而且容易变化的商品,人们很难选择它来作等值物,很难以它来说明白己商品的中间价格。如果有人以这样的商品来作为自己商品的中间价格,则只能给人们一个含糊不清的概念。在他看来,能够便于人们选择来充当衡量商品价值尺度的商品,应

当是质量统一而且比较固定的商品。杜尔阁的这种认识正确的一面是只有质量相同的东西,才能成为衡量价值的尺度。因为质的同一性才有可比性。但他没有明确指出这个质是什么。从他前后的论述看,这里的质是指使用价值,并且说商品的价值会随着它质量的变化而按比例地发生变化这种认识是错误的。(5)为了使商品的价值只与其数量发生关系,不与其质量发生关系,杜尔阁提出要确立标准的估价单位。如要以羊作为估价单位,但羊有大有小,有肥有瘦,有老有幼,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把一只中等年龄和中等身体状况的羊一般价值作为他们的估价”。被确立的用以作为标准估价单位的商品(如一只羊)便单纯地代表着一定的价值,人们就以它作为价值单位来说明白己商品的价值量(如多少只羊),这样,这个商品就完全代表着一种虚构的和抽象的价值,而不代表商品本身。杜尔阁的这种见解,正确的一面是,作为尺度价值的商品本身是价值的代表,它作为价值的存在也是一种抽象,如把各种羊的差别抽掉,使羊的价值成为一般羊的价值,所以,人们能够把它看成是价值的单位用以表示自己的商品价值量。但,不能说作为尺度价值的估价单位的价值,是虚构的价值。因为作为估价单位的商品都是劳动的产品,它本身凝结着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把货币的产生说成是交换需要等值,从而需要确立标准估价物,是杜尔阁的创见。这种见解不仅与他的先驱者布阿吉尔贝尔的货币起源的学说不同,也与他的同时代人亚当·斯密的货币起源的学说不同:布阿吉尔贝尔把货币的产生看成是在商品交换中需要货币来充当担保作用;亚当·斯密把货币的产生看成是在商品交换中需要货币来充当媒介作用;而杜尔阁却强调它的估价作用;布阿吉尔贝尔和亚当斯密都认为充当媒介作用和担保作用的货币可以用没有价值的符号来代表,而杜尔阁却认为充当货币的商品必须具有价值;布阿吉尔贝尔和亚当·斯密都把金银看成是货币的化身,而杜尔阁却认为可以是金银也可以由其他商品来充当,他认为只要标准估价商品一经确立,货币便产生了,而不论它是金银还是羊。

(上接第 48 页)

Working Paper, No. 128.

Konings, J. and Vandenbussche, H. (2000): "The Adjustment of Financial Ratios in the Presence of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Evidence from Bulgaria", Preliminary Working Paper, Catholic University of Leuven.

Kornai, J. (1986):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Kyklos*, 39, 3-30.

Kornai, J. (1980): *The Economics of Shortage*,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Li, D. and Liang, M. (1998): "Causes of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Evidence on three Explanation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6, 104-116.

Maskin, E. and Xu, C. (2001): "Soft Budget Constraint Theories: From Centralization to the Market",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9, 1-27.

Raiser, M. (1994): "The No-Exit Economy: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and the Fate of Economic Reform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Development*, 22, 1951-1967.

Roland, G. (2000): *Transition and Economics: Politics, Markets and Firm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Schaffer, M. (1997): "Do Firms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have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Concepts and Evidence", Discussion Papers, Centre for Economic Reform and Transformation, Watt University.

Segal, I. (1998): "Monopoly and Soft Budget Constraints",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29, 596-609.

Sorkin, A. R. (2009): *Too Big to Fail: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Wall Street and Washington Fought to Save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mselves*, London: Penguin Group Limited.

World Bank (1996): *The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from Plan to Market*,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